

第四章 “匹马入楼兰”楹联与“奋绩绥疆”匾额

匹马入楼兰，仰视飞鸢，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
只身还栗里，倦怀归驾，好藉此名山老去，松杉曲径昼眠琴。

——邑人炳然 郑开文题书 中华民国五年孟冬^[1]

第一节 参加援疆平叛事件的缘由

楼兰古城在中国西北的新疆腹地，距云南远隔千山万水，更以荒漠戈壁著称，非常人所及。以民国初年的交通情况计，云南人要去新疆楼兰古城无疑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然而，郑开文撰写此楹联描绘了“匹马入楼兰”的真情实感，是真有其事，还是虚拟或泛指，让后辈诸人很是不解。那么，就让我们一探究竟，郑开文去过楼兰古城没有？去干什么？

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事戛然终止，郑开文被云南都督府任命为榆联（大理团长），与滇西辛亥腾越起义革命领袖、大理提督张文光一起，统辖滇西军政事务。由于蔡锷扩编云南陆军第三师的计划受到袁世凯猜疑否定后，云南辛亥革命期间大量扩充的援川、援黔、援藏的军队即处于收缩整编阶段，榆联职务实际上是滇西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郑开文在大理工作的时间不长，却是政声斐然，时人称道“境内盗贼潜消，庶务俱举，旌节所及，口碑载道”，创地方静宁、百姓安居乐业的一时之盛况。

1913年2月14日，在一则题目错印的《大理周震君追悼会广告》中，开列有郑开文的名字。若不是笔者熟悉郑开文周围的人与事，几乎就错过了此则能表明郑开文与张文光协同治理云南大理的经历以及其对革命同志深厚情谊的历史资料。广告云：

晨星西郎，贤士寂寥。溘露朝唏，老成渐逝。望西洲而增恻，念东阁而悲吟，此古人追悼之所由与也。大理周霞君因公致疾，淹缠月余，竟于阳历二月十四日辞世，城乡士庶咸增伤感。方当大殓入棺，吊客即以千数良由：生平以医药为仁术，无问富贫，凡延诊者必赴，无力者必济。指下生春，活人已博。故感情所及，无问亲疏。然此特其小节，为一般社会所交赞，尚非君之鸿烈也。溯其垂老游洋、归国讲学，演剧烈之思潮，转顽固之风气则功在学界。效职军医，敢言革命，述列邦强有力之野心。劝士卒军国民之主义，舍头颅之重价，见虏匪以单骑则功在军界。去冬，国民党政党举君代表联合十九属当选人组织，议员意见分歧，对待危险，君竭内外调和之苦心。即褫口膏盲不治之重症，则功在政界。

呜呼！生非虚度，死可留名。以视屈平，爱国形瘁三湘，诸葛鞠躬风凄，五丈何多让焉。今者盖棺论定，吊鹤频来，同人等拟于四月初六日（即阴历二月三十）为周君就三公祠联合各界绅姥开追悼会，务望悉表同情，届期午前十二时，齐集会所。呜呼！公道自在人心，我辈同声一哭。凡有感言，尽堪发表，口口旧典，型之泡幻，应使死者复生，掬烈士暮手之壮心，并为后来人劝。谨此通布。

发起人：张文光、郑开文、黄奕、李厚本、苏绍韩、范宗莹、杨棠仁。^[2]

笔者根据文章措辞风格与叙述的周君生平以及当时大理军政界的官秩，几乎就可判定此文必

然出自郑开文之手。其实，这位周震君真名为“周霞”，标题铅字排版时将“霞”误排为“震”字。1904年7月1日，郑开文与周霞等人由昆明出发，徒步数千公里到贵州镇远后，才坐船至上海转海轮去日本留学，是为同学、战友、革命同志，故有“望西洲而增恸，念东阁而悲吟”的深厚感情。提起周霞先生在日本留学的经历，那可真是当代云南人的荣光。日本维新变革，特别是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国力增强，民气大振，自信心膨胀，普通日本老百姓是很看不起中国人的，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知识落后，人品猥琐。其实，能够去日本留学的大多数中国人，无论从学识，体格、相貌、精神都可以说是泱泱大国的精英群体，知识水平多数是秀才、附生，举人，甚至还有进士、翰林。他们面容清秀，举止文雅，思想新潮，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所表现出的执着、热情和努力，连普通日本人也很惊讶羡慕。云南留学生周霞，留学日本时已年满六十岁，银发白须，坐落在课堂里，精神抖擞，一丝不苟的听课，做笔记，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感人至深。不但日本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宣传其人其事，还得到日本天皇的亲自接见。周霞先生归国后，亦有鼓吹革命，特别是在学界、政界、军界倡导革命思想、民主思想，“溯其垂老游洋、归国讲学，演剧烈之思潮，转顽固之风气则功在学界；效职军医，敢言革命，述列邦强，有力之野心。劝士卒军国民之主义，舍头颅之重价；见虏匪以单骑则功在军界。去冬，国民党举君代表联合十九属当选人组织，议员意见分歧，对待危险，君竭内外调和之苦心。即赝口膏肓不治之重症，则功在政界”的鸿烈勋绩，尤为值得人们纪念。盖棺论定，吊鹤频来，是郑开文代表革命党人向周霞先生致最后的敬礼。

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国大地风雷滚滚，黑云压城，到处弥漫着腥风血雨，而郑开文却在大理、在云南的军政界消失了。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发动了“二次革命”，对袁世凯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驱除国民党籍议员直至废除国会、篡改《临时约法》的倒行逆施进行激烈的武装抗争。受孙中山、黄兴的指令，7月12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进驻九江，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至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云南滇西地区亦发生反袁的武装起义，最终被滇西镇守使、云南陆军第一师谢师长派兵镇压。大兵压境，缺乏组织和训练的起义军不堪一击，坚持了半个多月的杨春魁武装起义成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尾声，随后滇西提督张文光在腾冲硫磺温泉被枪杀。

在滇西二次革命浪潮中，大理陆军团长郑开文理应首当其冲。但是，作为革命党人，他没有出现在滇西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名单中。作为滇西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也没有出现在率部镇压滇西起义的官军名单中，让人颇觉意外。

1913年的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俄蒙军队南下进攻内蒙古、新疆的事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荡，清朝的统治风雨飘摇，灭亡在即。此前被内蒙古放垦移民浪潮和清朝新政所惊惧的外蒙僧俗统治上层，在求得沙俄的支援后，趁机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建立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蒙古国”政府，并先后向漠南蒙古各旗发出通报，号召响应“独立”，归顺并加入“蒙古国”。与俄罗斯接壤的呼伦贝尔各旗率先响应，于1912年1月中旬宣告“独立”，并先后武装占据呼伦城（今海拉尔）、胙滨府（今满洲里）及中俄边界各边卡，数月后即归附“蒙古国”。与此同时，在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各旗公开表态反对共和，

支持蒙古“独立”，一时间，漠南局势动荡，人心浮动。据库伦政府内务部的统计，截至1913年11月，内蒙古六盟五十旗中已有三十五个旗表示归顺“蒙古国”。

外蒙独立，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根基尚在动摇之中的袁世凯新政府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国难无所适从。如果倾北洋之力加以围剿，必与沙俄接兵，战端烽起，无论胜负，北洋实力受损，又会被南方革命党所乘；如果不维护国家统一，新政府形象又会损于国民。藉此盘算，袁世凯政府对于外蒙傀儡政权采用的政治、宣传方法多于军事行动，除了对内蒙古设法争取，阻止其和“库伦政权”勾结外，对外蒙方面也下了不少力气。一面数次发布政令，劝谕蒙藏各族拥护共和，劝导外蒙古取消“独立”，袁世凯和“库伦政权”君主哲布尊丹巴通信就是其中的一项策略，是以政治上希望有所挽救。并于1912年8月21日、9月20日先后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和《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的“大总统令”，以此笼络蒙古上层。还分别向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盟派遣“慰问员”，宣布共和要义，安抚蒙旗上下。一面派遣兵员镇压起事之蒙旗，以阻止事态的蔓延。

在西北地区新疆，1912年5月起就受到沙俄和蒙古叛军的进攻，科布多城于8月沦陷后，新疆军队在察罕通古、阿尔泰一带构筑防线，打退俄蒙军队的疯狂进攻，将阿尔泰地区控制在民国军队手中。

纷乱至1913年初，情况进一步恶化，外蒙古在沙俄帝国的援助下开始派兵南下，分路攻入内蒙古中西部，以期“收复”内蒙古，妄图建立所谓的“大蒙古国”。起初，外蒙军队先后击败防堵的民国军队，占据了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盟的大部、张家口、多伦若尔（今多伦县境）以北的锡林郭勒盟的大部以及察哈尔北部及昭乌达盟北部的广大地区。1913年3月起，民国政府陆续派重兵增援，经过数月的苦战，至1913年底终将外蒙各路军队逐出内蒙古，稳定了国民政府对北疆的统治。

外蒙叛乱的消息传到云南，原西征滇军将士纷纷请战，盼望以西征锐气，移转为北伐，愿先捐躯，以死拼之。下述滇军将士的请战电文，间接表达郑开文引导原西征滇军官兵积极备战，刻苦训练，随时准备出征，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立新功的过程。

1912年12月23日《天南新报》载西征滇军驻丽步兵第一营长贾紫绶电文，曰：滇都督、各报馆主笔、第一师长、楚雄西征行营殷司令、大理郑团长钧鉴：顷奉团部令开：俄人助蒙独立，谋我主权等语。宣之部下，士气大振，金言愿为敢死队，早见疆场，争先恐后，跃跃欲试。窃以西征锐气，移转为北伐。绶（贾紫绶）忝为一营代表，愿先捐躯，以死拼之。现在军佐护兵均操练，准备听候军令。西征滇军驻丽步兵第一营长贾紫绶叩元印。^[3]

原西征滇军驻丽江营长张贵祚也递传请战电：（编者按）雄心勃勃之张贵祚：

昨鹤丽镇任暨丽维统领张贵祚电称文曰：军都督、西征司令部钧鉴：祚荷重寄，驻防西边。自至中甸，因头部旧有伤疾，加冒雪风，日患头痛，坐卧难支。适西征军事未清，边防紧要，勉力整顿不敢言辞，上负委任。旋奉明文，霸俄助蒙独立，并闻省议出师讨蒙征俄，踊跃三百，愿报奋勇当先，为我国力挽主权。现查阿墩与藏番通商贩易复常。近防无事。而祚头痛依然，拟恳府赐体察，准辞鹤丽镇暨丽维统领差。俾早日回省就医，行痊愈即请委附大军讨蒙伐俄，以偿夙志。愚忱纵或讲和停战，而霸俄久蓄雄长五洲野心，终必思逞中华。愿请委祚游历西洋，设为最

先准备，以为异日必胜地步，若仍使祚镇守无事西防，羈死于痛，不惟报国愚志不伸，亦无补于民国大事。^[4]

上述西征滇军驻防滇西各地官佐的电文，“顷奉团部令开：俄人助蒙独立，谋我主权”“旋奉明文，霸俄助蒙独立，并闻省议出师讨蒙征俄，踊跃三百，愿报奋勇当先，为我国力挽主权”等语，均表明大理团长郑开文曾发文宣示西征滇军驻防滇西各部，通告沙俄帝国助蒙独立，中国北部边境战火重起，云南省将出师讨蒙征俄的情况，训示我部官佐应加强训练，随时准备移西征锐气为北伐决心，早上战场，为国再立战功。

随着蒙古风云愈演愈烈，云南《天南新报》1913年3月19日报道：（新疆都督）杨增新电：俄兵由伊犁进发威尔尼、明瑶，两处已被强占。两天后《天南新报》又载：“袁总统接新疆都督杨增新来电，报告科布多刻甚危急。特电飭张作霖统领二十七师往援。”形势十分危急，风声鹤唳，北洋政府已不能停留在仅仅分发信函或外交辞令就能阻止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叛乱分子在沙俄帝国的挟持下出兵侵犯内蒙古时，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各省都督均声言出兵平叛止乱，迫使袁世凯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统一，并有了基本的应对方案。据云南《天南新报》转载相关内容称：

大总统决计征库（伦）：大总统以中俄交涉问题，此次俄使答复仍复含糊无正当之磋商，是表面上为中俄交涉，其内容实为缓兵之计。日昨特召外交陆总长、陆军段总长、参谋陈次长及军事顾问、各重要人员，在府开秘密会议，决计征库。当即拟定办法（一）令国务院将孙、黄、黎、程及各都督、重要人员条陈征库办法，会议议决，采择实行；（二）令外部通告各国声明征库系主国讨从国之例，各国当严守中立；（三）令参谋部将决定征库计划密电各省；（四）令陆军部将军队迅速编定候令出发；（五）令财政部核算军费设法转选；（六）令蒙藏局速拟讨库檄文、征库理由文告，颁布蒙藏各省；（七）令各省都督通飭军队联合北征；（八）令各省兵工厂。

文中征求“孙、黄、黎、程及各都督、重要人员条陈征库办法，会议议决，采择实行”一语，当指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在关系到新生共和国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孙中山先生的表态尤显重要，《申报》登载消息说：

孙中山先生来电，参议院公鉴：俄蒙事件据文所得确信，乃俄国一二野心家主动，非俄政府多数主张，若我坚持皆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务望留意。孙文铄印。^[5]

各省都督均表明积极出兵征战外蒙的要求，惟云南都督蔡锷的姿态略显消极，他没有直接呈文袁世凯，而是通过都督间互通电文来表明云南要求出兵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云南《天南新报》1912年12月6日载《蔡锷致盛京张都督电》云：

盛京张都督鉴：皓电悉。蒙俄私约，实只库伦活佛及外蒙二三王公为俄人所愚，甘心背叛，其余全蒙经执事抚驭归诚，良堪企佩。惟民国初立，五族同化，岂容任听鸱张。除电政府严重交涉，务令取消并通电各省预备实力对待外，滇虽瘠远，亦应简练精锐，听候政府指挥，仍希将近情随时赐教为盼。滇都督锷感印。

蔡锷“应简练精锐，听候政府指挥”的表态，略显消极、淡漠，理由是“滇省有兵没钱”，亦提醒袁世凯上年援藏平叛的70万军费还没有拨给云南呢。还因为去年云南积极出兵援藏救川，滇军奋力向前，战果卓著，而袁世凯却怕蔡锷因此坐大，川督尹昌衡忌云南趁势介入川省势力范围，两人都要尽手段，迫使滇军中途退兵，功亏一篑。落得人财两空，北洋、川省两面不讨好，让蔡锷将军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

广东胡汉民、陈炯明也是都督们保家卫国调门高唱之人，惟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的调门最为响亮。《天南新报》载有消息称“龙家军想吃鹅（俄）肉，云南人当如此”的报道：

（街略）于十九号下午五钟均接有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电云：济光前由省往东江勘矿途中，阅载俄蒙协约，怒发上冲，当即返省，筹备统军北征。又阅报，陈军统炯明自请前往征讨。奉大总统命，先从外交入手，再定内部方针，足见大总统谋定后动，审慎周详，莫名钦佩。惟我武不扬，樽俎莫得，折冲之效古今中外莫不皆然。济光抵省，即电商耿光颢及处统领、滇黔旧部，均得复电，矢志征库，再四思维，库伦系我藩属决不能任其自由结约之理。今一旦背叛民国，命将出师征其不庭与俄人毫无干涉。龙家子弟敌忾同仇，散处蜀黔滇粤，闻有由济光编成一师候命，即行马革裹尸亦所甚愿。目下陈军统足资镇慑，济光如同赘疣，伏乞大总统早定大计，勿疑勿忌，或谓北地苦寒，南军欲往，诸多不便，詎知济光所统各军皆身经百战，滇省有周年不化之雪山，我军奔走追逐不以为苦，此乃济光之所以敢自信者。我军征库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如强俄敢为助逆，济光必痛剿，直捣其界穴而后已。时不可失，请速下令，以便启行。区区愚忱，伏乞翼鉴之。云云。^[6]

但是，真正到了派兵遣将实际运作时，胡、陈、龙却提出缺乏“军事优长者”的理由，没法出兵。当时代最有钱的省份非广东莫属，自然不好意思说比别省穷、没钱。广东掌控有两师一旅的军队，也不能说无勇。但是，众人尽知，执掌广东实际军权的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的济军以抢劫扰民见长，以镇压乡痞游勇为著。连龙济光本人也晓得，若真要拉上战场，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来。这没有“军事优长者”还是可以搪塞敷衍一时，而滇军训练有素，勇猛善战的闻名遐迩，特别是民国肇立后首次盐井战役的胜利，更是让郑开文等滇军将领声名鹊起，民国人士那个不知，那个不晓。袁世凯到底是个行伍出身的枭雄人物，深知真实的战争中实力惟上，骁勇的将士和源源不断的军饷最为关键。广东、云南推却的理由让其醍醐灌顶开了窍，就此顺水推舟地来了个组合计策：云南出人，广东出钱，组成滇桂黔联军出征库伦，平息蒙古叛乱。因此有《天南新报》1913年3月17日载称“袁总统派龙济光为云南镇抚使”的消息，极可能与袁世凯委任龙济光组成滇桂黔联军出征库伦有关。

3月24日《天南新报》转载进一步的信息，称：“政府决议由奉、吉、黑、湘、鄂、粤、皖、豫、桂、滇、黔及徐州挑选精悍军三十万，分作六军征蒙。以王天纵、龙济光、黎天才、吴俊升、倪嗣冲、陈炯明等统之。”

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政府先是要求各省派遣“军事优长者”到京开会，筹措征库的具体办法。《天南新报》刊登消息称：“军事处廿一日电至各省都督，令各选派军事代表二人来京会议征讨库伦及各处边防问题。”从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看，被认定为“军事优长者”并参与此次会议

的人员规格如何？云南方面派谁参加了此次会议？遂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笔者查阅到一则可资参考的资料，云南《天南新报》1913年1月16日登载消息称：“昨陆军部接东督电，奉天派周肇祥，吉林派裴其勋，黑龙江派袁庆恩为军事代表，参与中央征库会议。”由此则报道分析，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参加北京征库会议的人员，级别并不高，大抵是师、旅长，并且是具有剿抚平乱实战经验的前线指挥人员。以笔者掌握的材料，这三人中，职务和事迹比较明确的是吉林省裴其勋旅长，他曾于1912年7~10月间，率吉林陆防军第四十六混成旅，“当派一支劲旅驰赴新城，探敌情虚实，渡松花江，进抵大赉、安广、洮南各属，会合奉、江军队，相机剿抚。一面亲督大军，直抵农安，进规郭尔罗斯前旗”，“赖各将领之忍心毅力，得以荡平此乱，转危为安”。^[7]显然，裴其勋旅长的经历、职务与郑开文率领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有相似之处。援照此例，陆军部召开中央征库会议，若征求云南方面的人员参加，郑开文与会的可能性最大。

此次平息库伦叛乱的军事行动保密程度很高，全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包括188卷、洋洋数千万字的《北洋政府档案》（影印件）均没有此次军事行动的记录，云南参加北京征库会议的人究竟是谁，没有可征信的材料予以确认。但是，此段时间郑开文活动的迹象表明，郑开文参加了此次中央征库（伦）军事会议，参与决策抵御外蒙远征军侵扰内蒙古、新疆的军事布置，并率滇桂黔先遣队实施了援疆征库的计划。举例如下：

(1) 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事结束不久，郑开文是云南唯一进藏并指挥了援藏平叛战事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率部有正规军二大队（营级）及边防军两营、维西协防军壹营，其兵力亦相当于混成旅编制。具有在边疆、民族地区平息叛乱的实战经验，获得“军事优长者”称誉当之无愧。云南方面推荐郑开文出席北京征库会议符合陆军部、参谋部挑选参会人员的要求。

(2) 郑开文1913年3月间在北京活动的迹象，表明郑开文其时在京受领援藏平叛的勋章奖章和参加征库军事会议。北洋政府陆军部1913年4月22日呈国务院文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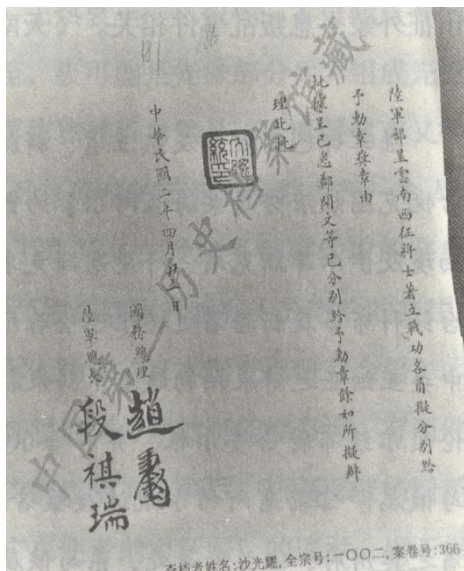
陆军部呈云南西征将士着立战功各员，拟分别给予勋章奖章由。批据：呈已悉，郑开文等已分别给予勋章，余如所拟办理。此批。国务总理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廿二日。

无独有偶，1914年4月25日，云南《义声报》报道消息称：

云南将军行署：为牌示案准，陆军部咨开：案查上年滇军西征出力人员即本年克复大理出力人员均已先后奉大总统令，各给予勋奖章在案。此项勋奖章应即颁发，以资佩带（戴）。除郑开文等业经就近领取外，相应开列名单，检齐勋章二十三座，奖章四十座，执照六十三轴，一并函送贵将军府，查照转发等由，准此。除栗飞鹏等四十四员已由本署查明，分别饬发在案，其余朱家齐等十九员无从查询。合将该员等员姓名开列，仰即自行到署投领，以便发给。须至牌者，计开：朱家齐、宝堉、李天保、谢昆山、普文明、杨星焯、刘钟俊……

迟迟一年后，方将西征滇军将士的勋章、奖章发到个人手中，这北洋政府的办事效率真是可以啊。笔者依据史实，确认该授领勋奖章人员名单中，既有1912年援藏平叛的作战有功人员，如朱家齐、李天保、谢昆山、刘钟俊等人；又有1913年底，平定大理民军起义的有功人员，如范石

生、华封歌（两战均参与）、普文明、杨星焯等人。这两则报道表明，郑开文等人已于1913年4月22日前“业经就近领取”勋奖章，显然指在北京陆军部就近领取勋奖章，而其他立功人员的勋奖章则由于外蒙战事以及二次革命等原因，延宕至1914年4月才予发放。由此可见，郑开文在北京领受勋奖章可以确认，可能还包括江映枢、贾紫绶等也在北京受领奖章。当然，云南远离京城，郑开文等人不可能仅为领取勋奖章就远涉万里到京，其公文表明郑开文作为云南遣派的军事代表，参加了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征库军事会议，是为郑开文率军远征库伦的前奏。



北洋政府国务院《云南西征将士着立战功各员拟给予勋章奖章》公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3) 北京征库军事会议决策的内容与郑开文统领滇桂黔联军先遣队出征外蒙平息叛乱事件相关。《天南新报》登载中央军事会议消息称：

陆军部已将蒙边及东三省、新疆防御区域划为五大区：（一）自外蒙古悦克图经唐努乌梁海至阿尔泰为第一区，系与俄属西伯利亚萨拜喀勒省西境及伊尔库斯克省、叶尼塞斯克省接壤者。（二）自外蒙古之乌里雅苏台经科布多及新疆省之塔尔巴哈台厅、塔城等处至伊犁为一区，系与俄属中央亚细亚之斜米帕勒廷省、斜米勒精省接壤者。（三）自黑龙江省之呼伦贝尔经布特哈墨尔根、齐齐哈尔至黑龙江等处，系东清铁路北段所经与俄属萨喀勒省阿穆尔毗连接壤者。（四）自黑龙江省之呼兰城经吉林省之宾州府、依兰府等处，系与俄属阿穆尔省接壤者。（五）自哈尔滨沿东清铁路经宁古塔、至珲春等处，系与俄属东海滨省接境，而与海参崴、海口相近者，并订防御之策四条（一）添调精兵驻守以上各防御区；（二）预备各防御区所足用之军火；（三）中俄交通各孔道释要设卡驻兵；（四）绝俄遣兵之路。^[8]

1913年3月5日《天南新报》继续登载中央军事会议消息云：确定分五路进蒙平息叛乱，龙济光统滇桂各军征库。政府拨调各军赴北方五处（一）王天纵统河南北各军；（二）倪嗣冲统淮徐各军；（三）黎天才统鄂湘各军；（四）陈炯明统粤东军；（五）龙济光统领滇桂黔各军。这些报道，将龙济光统领滇桂黔联军的作战区域列为第二区“自外蒙古之乌里雅苏台经科布多及新疆省之塔尔巴哈台厅、塔城等处至伊犁为一区，系与俄属中央亚细亚之斜米帕勒廷省、斜米勒精省接壤者”，此为龙济光统领滇桂黔联军，出征外蒙平息叛乱的具体军事部署。

当然，龙济光时任广东副护军使，正热衷于广东权柄，不可能放弃问鼎广东的大好机会，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极可能是先派部分兵力组成先遣队，以探虚实，根据后续形势的发展再作算计，自然是一个既得名声又得实利的算计。倘若，龙济光把率先遣队远征库伦的苦差事全权委托一个人，会是谁？回答必曰：郑开文是也。除了郑开文在援藏平叛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外，郑开文与龙济光在1909年广西编练新军时就有十分融洽的交往，是龙济光部队公认的“军事新知识领军人物”（日本国支那研究会语），因而挑选郑开文为滇桂黔联军先遣队统领出征外蒙的可能性最大。有两件事与此选择有关联：其一，察军通古防御战基本结束后，新疆都督杨增新有发往国务院、陆军部电文称“留下广东使者助力新疆”的请示，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具名，时间是1913年9月（见民国政府陆军部电文处置记录）。此时，龙济光因镇压二次革命卖力，取得广东都督权柄，而由他领衔的滇桂黔联军，自然又移称为广东军队的一部分，郑开文可能就是“广东使者”的代称。新疆都督杨增新是云南蒙自人，想留下云南老乡郑开文辅助其军政事务，自然有其利益的盘算，若是普通人员，则不需要请示政府。其二，征库事件结束后的1914年4月，郑开文得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长，是否也隐约归结为郑开文曾作为滇桂黔先遣队统军远征库伦，军功需酬或人才难得，龙济光才容忍革命党人身份的郑开文进入广东军界。

(4) 郑开文统领滇桂黔联军先遣队远征库伦的具体过程，因为其时军事行动保密的需要，没有留下可资参考的资料。但是，郑开文在通海秀山公园海月楼遗留有“匹马入楼兰，仰视飞鸢，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楹联，楹联中“楼兰”当然是新疆腹地楼兰古城，“寄亭”自然是通海秀山公园内小巧玲珑的“寄亭”，清晰表明撰联者、通海人士郑开文曾参加了民国二年中华民族抗击外族侵略的科阿战争（民国初年，沙皇俄国策动外蒙军队侵略科布多和阿尔泰的战争，称之为科阿战争）。

第二节 两次科阿战争的特点与新疆的军事实况

为落实郑开文“匹马入楼兰”事实真伪，笔者曾两次到达新疆乌鲁木齐、阿勒泰、布尔津、红山口、喀什、若羌（楼兰）、依吞布拉克；青海省茫崖、格尔木、西宁；甘肃兰州等地区，寻找郑开文在1913年间率部远征万里，平息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蒙古属中国版图）叛乱的战事线索和遗迹。综述如下：

早在清朝统治时期，沙俄就企图将新疆划为自己的版图，虽未得逞，但其对新疆的侵略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辛亥革命后，军阀各自为战，中原大地战争不断，中央政权无暇顾及边疆地区，沙俄便乘机唆使外蒙独立，并借伪称独立的外蒙政权，意图先侵占科布多、察军通古与阿勒泰区域，然后南下攻占新疆全境，完成历代沙皇大帝梦寐以求的强占新疆，并以此为根据，打通印度次大陆，实现通往印度洋的雄伟战略。为此，杨增新刚上任新疆都督，沙俄政府就在北疆一手挑起了科阿战争。

阿尔泰位于新疆北部，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初属科布多，光绪三十二年，科、阿分治，另设阿尔泰办事大臣管理，住承化寺（今阿勒泰市）。阿尔泰与新疆内陆相隔沙海而望，这里水草丰美，矿产丰富，是我国西北精华所在。垂涎欲滴的沙俄政权早就想独吞这座美丽的阿尔泰山，使这一地区归其版图，永久拥有。1912年6月21日，在沙俄帝国政府的

唆使下，外蒙政权派教官 200 人，杂俄国军事人员 20 名，由有杀人恶魔之称的丹宾加参带领，由俄人供给武器，并邀集乌梁海与科布多一带降服的部落，共 4000 人左右，血洗科布多城，目标是夺占阿尔泰地区。科布多告急！阿尔泰告急！

在如何对待沙俄帝国策动外蒙政权攻击科布多、阿尔泰地区的问题上，刚上任新疆都督不久的云南人杨增新能够从国家、民族大义上，清醒认识到维护国土完整的重要性，并不计个人前途名利以担当重责，令人肃然起敬。杨增新说：“以新疆形势，如科阿军事办理未能得手，势必扰及新疆，因新疆之塔城、精河、乌苏、焉耆等处多为旧土尔扈特。各部落牧地与科地蒙古声息相通，万一各处蒙古被其煽惑，相率牵动，新疆之事必不可收拾。”这一发而牵动全局，“故经营科阿较之联合新伊其势尤万不容缓”。

科布多参赞急电乞援，北京政府转电杨增新云：“科城危机万分，该都督应遵叠次电令，派兵驰援，以固北路藩篱。”对此，杨增新深知科布多“为全国西北门户，且与新疆巴里坤、奇台等处壤地毗连，万一有变，新疆大局攸关”。科不保，则阿尔泰不保，阿尔泰不保则意味着新疆不保。且北疆塔城、伊犁等地居住有众多旧土尔扈特部，若与外蒙古相互串通，里应外合，新疆必定大乱。但此时新疆“饷绌兵单，几乎再无可发之兵”，杨增新顶住压力，第一时间抽调部队“由古城招募马队一营，另回队一营”驰援科布多，并要求阿尔泰地方官员“发派援兵若干、祈将管带数名及营制饷章咨送，以便连为一气，可为得力”，后又“由省城派马步两小营、大炮两尊增援”。

在此过程中，沙俄通过外交手段向杨增新施加压力，以迫使中方放弃增援科布多。沙俄驻迪化领事向杨增新照会：“本国政府近闻科布多之变，贵都督业经派遣官军前往剿办，并闻迩者喀什噶尔之变，譬方亦有增兵之举。果如所闻，则此举洵为致乱之阶。盖以贵省官兵抵喀，设因误会，两军致气冲突，则前此地方之乱致死灰复燃，乱端再起。尚不及早清厘，延至激成中俄两国重大交涉，本国政府彼时惟认专贵都督暨新疆地方官员之责治是也。”而新疆杨增新则不以为然，回复沙俄领事：“查科布多为中华民国国土，即在本国大总统施政职权范围以内，现在该处出有事乱，本部都督迭奉本国大总统命令，派队往援是本国政府为平定内乱祸起见与贵国毫无关系，请贵国政府查照中俄协议办理。”另外提醒部下：俄领事与我外交司交涉实系出于尝试，无论如何恐吓，尊处切不可听。^[9]

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即告失手。杨增新在民国元年 10 月的追责电中，愤怒地说：“科城失守，溥参赞陷入贼中，被人挟持不能自主，而延参赞畏葸不前，实非应变之才，若以收复科城诸事宜付之该参赞，必致贻误。”而且“该参赞在阿尔泰迟迟不行，直至科城失守尚无动身消息，实属怯懦无能，难应兵事”。大敌当前怎能居外观望，鉴于科布多事体重大，中央应“另简贤能，庶科城军事方有转机。”对科布多的失守，杨增新预感到战火即将燃到身边，他痛心疾首愤怒地说：“增新向来办事以和平为宗旨，断不轻开罪与人，惟参赞贤否关系全局，未敢见好同僚，意安缄默。至增新于援科事宜未能迅赴戎机，咎实难辞，应请一并惩处。”总之，外患失地，内扰失机，兵单饷绌，杨增新在科阿军事进行上，困难重重已显见一斑。

【相关链接】

杨增新着《补过斋文牍一防蒙篇》之《电呈援科援阿情形文》：

……援科兵队除拨马队两营外深恐兵力薄弱，有误戎机，又添拨马、步队二营，炮队一营，责成副将张鸿畴统带前往，均经电呈在案。然最可虑者，俄人干涉诸形棘手。兹奉电示已交部办理仰见大总统注重邦交主持边局之至意感激莫名，惟现据阿尔泰君王帕勒塔电开，探得科城蒙匪数达3000人，有分兵来阿之信。祈派步队一营来阿，缓恐无济等语。新疆人心粗定，省城为根本重地不可无兵镇压，此次为科援兵，筹饷备械已觉万分为难，况哈密叛缠正议收抚，是镇西、哈密之兵未便遂意撤退，又统计援科马步炮各营不过1000余人，兵力尚单，科城匪事甚张，若不绪筹援应，尚恐寡不敌众难期得力，应俟哈密叛缠收抚后再行酌量办理，查援科军队筹备已属十分费力，今阿城又复告警，以新疆形式论，如科阿军事办理未能得手，势必扰及新疆，因新疆之塔城、精河、乌苏、焉耆等处多为旧土尔扈特，各部游牧地与科地蒙民生息极易相通，万一各处蒙民被其煽惑相率牵动，新疆之事必至不可收拾，故经营科阿较之联合新伊其势尤万不容缓。增新莅事未及三月，日在荆天荆地之中，然新伊协商已成，南疆秩序渐复，经权互用、开诚布公，方期地方渐有起色，籍纾大总统西顾之忧。今科阿险象如斯，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实属焦急万状，现在惟有力任艰难免为支撑，一面再设法筹拨援兵，力解科围，科围一解，则阿事自有转机。若再分兵援阿，将欲两顾必至两误。

察罕通古又叫“拉哈布拉克”，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山口，阿境温音其河畔，是通往科布多驿站的中继站，北距科布多660公里，西南距古城790公里，此处水草肥美，利于屯军，多山利于步兵布防，山地崎岖不利于骑兵驰骋，离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扎哈沁等部落接近，便于联络归附牧民。从察罕通古往南一日之路可达北塔山，北塔山之南再无险凭据，察罕通古若被外蒙控制，则新疆门户洞开，险象立见。新疆都督杨增新根据局势，从东线战略总局考虑，把保卫阿尔泰，拱卫新疆的坚固屏障设在察罕通古，派新疆陆军得力干将张健率新疆唯一一支现代武器装备的劲旅牢牢地钉在此处。调兵遣将驻守在科布多通往阿尔泰门户的布尔根河（今布尔津河）、察罕通古区域，以便相互呼应，待时机成熟再收复科布多。

外蒙军队攻占科布多后，积极备战，企图一举攻占阿尔泰山南部广大地区。跃跃欲试的外蒙军队对察罕通古驻营的进攻时有发生，据目击者亲述：1913年7月4日深夜，喀匪骑兵大队悄悄地摸向察罕通古驻营，漆黑的地面上，只见大片身影绰绰和无数凶恶的眼睛在发光，四更时，敌人已经靠近我驻营防区。敌人黑夜的行踪诡计，没能逃脱我察罕通古前总指挥官张健的耳目，此刻各营已在防区蓄势待命，骑兵队伍养精蓄锐，旗手坐稳马鞍，手把缰绳，马蹄挖动地面，嘴里发出“突突”的声音。战前，因敌我兵力悬殊，张健怕将士信心不足，影响士气，削弱战斗力，他对驻军全体将士鼓劲时说：“战场胜负不在人多势众，长坂坡张飞一人吓退几万追兵，战斗中勇破敌胆就可以少胜多，况且敌人奔跑一夜，人困马乏，我军以逸待劳，敌人深夜来袭，以为诡计多端，美梦得意时遇我当头棒喝必惊惶失措，见我早有预防，更是疑惧我军四处设下埋伏，必不敢恋战，我军只管冲杀，必须要有无所畏惧的勇气，被敌杀不如冲杀，此唯一解救之法。”再近，再近，哨杆上的卫兵可以目测到敌人的前沿马队，张健命令大营悬挂明灯，黑夜里，杜发荣营、杨修政营看到了出击的信号，一时枪声四作，双方枪炮声交集在一起，大炮轰轰，炮声雷鸣回荡在察罕通古的山谷之中。

天要见亮，哨楼上张健可以明见身穿青衣，头戴军帽，内杂无数便衣者，敌第一梯队扑倒，

第二梯队从后风驰电掣般冲杀过来，张健命令大营升起五色国旗，擂鼓不停助我冲锋。张健亲率第一营大队冲出营房，杜、杨及其他各营官兵一起跃出壕沟，杀声震天奋勇直前冲向来犯之敌，战马嘶鸣骑兵冲出栅栏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向敌群。敌我人马绞杀在一起，敌匪敌我不住，惊慌中狼狈败窜，大队逃回山谷，藏匿踪迹。此一役，阵毙敌 200 余人，战马 300 余匹，活捉两人，夺枪支数十；我军阵亡官兵 62 人，驮夫二名，受伤 98 人，驮夫三名，战马损 45 匹，失枪 32 杆。

首战惨败，喀匪受到沙俄主子的斥责，恼羞成怒，丹宾加参率大部喀匪自乌梁海南下布尔津河，后随有 4000 千俄兵助威壮其行色，并欲分兵截取我后路运道，包剿我布河驻军。1913 年 7 月初，敌从五云集、包庆墩两处再次发兵，夹击察罕通古。1913 年 7 月 11 日早晨，俄蒙军先用火炮远距离向我阵地壕沟狂轰乱炸，柴草马棚被火点燃，很快营垒一片火海，浓烟滚滚，随后敌人马队便开始狂袭。面对敌人马队猛烈攻击，新疆正面布置的部队以战壕为掩体，枪炮如万箭齐发密集地射向敌群。而由团副杨庆明带领营长马德贵及备补营全体官兵，按战前勘察的路径，从后面一条秘密捷径包抄过去。当敌人得意忘形之时，马德贵带兵如神兵天降突然从背后猛烈打击，敌人猝不及防，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纷纷逃窜躲命。一时间，我军鼓角齐鸣，勇猛的战士从壕沟掩体中跃起，马队如山洪激流冲向敌人。战斗进行到午时三刻，争夺约四个小时，将敌人击退到 20 里处，我军各营按要求停止追击全营回防。是日，共击毙喀匪 100 余名，重伤者不计其数，击毙战马 200 余匹；我军阵亡 5 人，受伤兵丁 7 人，丢失炮马 5 匹，枪械等件均未遗失，唯 40 匹小马队马匹在营外放草，被敌开花炮惊走，迷失敌境。

外蒙军队不顾北京政府与沙俄政府所商定的条约，两次大举进攻察罕通古，均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无力再次发动进攻，大败而逃。中国军队因为兵力单薄以及马匹匮乏，只能固守阵地，并没有乘胜追击。阿尔泰危机也终于得以缓解，于是杨增新向北京政府建议尽早商定谈判协定，双方最终于 1913 年 12 月 21 日签订《阿尔泰科布多中蒙军队驻扎线临时停战条约》，双方根据条约，均在规定时间内撤军，科阿战争至此结束。

从这两次科阿战争的情况分析，仅依靠新疆单薄的兵力和财力，应对强大的沙俄帝国支持下的外蒙古军队，可以说是力不从心，应对支绌。第一次科阿战争时，杨增新调集了新疆所有的军队，就感到应对困难，值第二次科阿战争，求助于国民政府给予财政、饷械的援助和军力支援势在必行。若以第一次科布多战役的新疆兵力与兵员配备情况看，显然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如此高水平的作战能力，是否与滇桂黔联军或甘肃援军有关？因为科阿战争涉及幕后主使者是沙俄帝国，而当时的中国国际地位又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公开与沙俄决裂开战是不现实的。袁世凯政府不想刻意张扬有援军支持新疆而导致事态的扩大化，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第二次科阿战争中觉察到全国特别是滇桂黔联军援助新疆，在察罕通古、阿尔泰地区构建防线，抵御了沙俄、外蒙军队的进攻的特别之处，这些援军的军官足智多谋，作战方式也与 1912 年 8 月的科布多战役有极大不同，在某些方面还具备现代军队作战的模样。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先生在《新疆五十年》中回忆到：“北路两线将士雄赳赳气昂昂在戈壁荒漠的旷野上，绵延不绝，这是新疆历来最显整齐的部队，一溜崭新的军装，为了显示战斗力，杨增新指令军装局给予一线士兵最好的武器，每兵足额发放三百发子弹，扔掉老爷式的来福枪，全部换成快枪，以资对敌震慑。”而当时新疆已兵穷财尽，仓促间募集的回民支

队、伊犁派之马队等民间武装，不可能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表象发生。还因为“新疆陆军多被袁前督带赴哈密、镇西一带，省城军队寥寥，当奉命援科之初，即添募古城旗兵马队一营，又派省城回兵马队一营定期开拔七月十五日。准廷参赞文电内开，援科马队承派两营良深感佩，惟粮料由古城采运实较科营尤难。所幸前派阿队业已抵科，又经溥将军拿获库派伪使正法，近来略微敛迹”。“至于阿尔泰防务新疆已派兵马队禹宝山、马致和两营，又派张鸿畴将援之马队两营、炮兵一队随改道绥来援阿，又有伊犁派之马队五营，新伊合计已在二千余人，免敷战守。惟布伦托海新疆现无兵可援，该处地方紧要应请大总统电飭广镇边使，将伊犁马队再行酌派马队两营前赴该处驻扎，此筹备援阿事宜之大概情形也。惟援科援阿各军队开拔后，新省地面空虚，各属会匪游民时虞蠢动，当需另拨兵队以资震慑，惟各省协饷断绝，哗溃堪虞。即欲就地筹款，而近年以来，缠民因差役之重，纷纷购买俄票争入俄籍，岂可再行搜刮，为渊驱鱼。”^[10]

笔者揣测，包儿汉先生看到的“新疆历来最显整齐的部队”，极可能就是外省的援军。摘录杨增新着《补过斋》之《电呈援科援阿军事情形并请拨兵饷文》电文，以此体会杨增新保卫阿尔泰的艰窘，同时也披露了甘肃方面援军由河西走廊进入察罕通古战区；滇桂黔先遣队由西宁——若羌——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尔泰支援察罕通古战场的痕迹：

……今科阿（科布多、阿尔泰）险象如斯，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实属焦急万状。现在惟有力任艰难勉（勉）为支撑，一面再设法筹拔援兵，力解科围，科围一解，则阿事自有转机。若再分兵援阿，将欲两顾必至两误。现已电商帕郡王拟有增新电伊犁广镇边使酌拨步兵一营赴阿，双方能表同情与否，俟接到帕王回电再行妥筹办法。

惟用兵固难，筹饷更难，新疆饷源早绝，所恃以流通市面者厥惟官票，一经出境遂失效力，惟有仰恳大总统飭财政部除皓电所拨湘款十五万两外，仍祈源源筹拨以济军实。……否则无米为炊，军民饥溃在在堪虞。不特科阿军情难以兼顾，至于科阿之事若赴援兵队未易得手。拟请一面由甘肃筹备军队以为后劲，仍请一面设法取消库伦独立以清乱源。万一不谐，即调甘肃大军西上助剿蒙匪，并以镇慑新疆似属一举两得。

后续的商议，还有杨增新《电呈请飭马镇福祥带队出关办理科阿剿抚事宜文》云：

科阿军事关系西北大局，新疆兵力本单不敷分部，查有甘肃西宁镇总兵兼青海民政长官马福祥凤姻兵事忠勇性成，若令将所部回队统带出关办理科阿剿抚事宜，当能得力。增新与赵都督函商意见相同，并电询该总兵亦愿出关，伏祈大总统特颁命令电飭赵都督转飭该总兵赶紧带队兼程前进。所需饷项甘肃无力承认应请飭部筹拔解新，源源接济以维边局。

综合上述材料分析，由于各省支援新疆抵抗外蒙军队侵扰阿尔泰、察罕通古的军事行动，属于秘密的军队机动，而且袁世凯还害怕军队挪动的风吹草动引起帝俄的警觉和不满，引起列强国家在华利益格局的骚动，故不可能向外宣传，这都是民国初年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所造成的。甚至，科阿战争几十年后，又涉及政权更迭，外蒙离失，导致这方面的材料无法布公，遗存极少，殊为憾事。此外，或许因为郑开文部因保守机密的需要，用代号、化名展现其部在科阿战役的位置和作用。以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还不能确定郑开文在此次科阿战争中的防线位置、战事进行的具体情况以及作战成果。

第三节 “匹马入楼兰”的心路旅程

郑开文“匹马入楼兰”楹联，先声夺人的开头第一句便是“匹马入楼兰，仰视飞鸢，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匹马”可以理解为孤身一人，也可引意为率领千军万马厮杀疆场的将军。从郑开文率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和率部远征库伦的经历来看，当可以理解为远征戈壁沙漠的最高军事长官，对自己所承担任务的自信感、责任感，同时渗透着戈壁沙漠行军的孤寂、艰苦之感。接下来的“入楼兰”一词最为显意，它是“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远征将士的真实写照；它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豪迈气概的潜台词；它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凌云壮志的蕴含；它是一代代边塞将士，为中华民族拓疆域御敌寇的壮怀激烈；它还是“功名祇是马上求”的军旅征战生涯的象征。作者巧妙地将眼前戈壁沙漠的远征将士与楼兰、荒漠的悠久历史和著名边塞军旅诗词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匹马入楼兰的豪迈气概，衬托着捍卫国家统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勇敢壮举。

“仰视飞鸢”则交代了心境和位置。当然，中国西部众多名山大川都有雄鹰翱翔在蓝天白云之上，但是，唯有大漠戈壁的雄鹰最为壮硕，最为孤寂勇猛，寓意远征库伦的将士不畏敌军之强大，不惧戈壁大漠之荒凉的报国壮志像雄鹰一样志存高远。郑开文仰视飞鸢而触景生情，此时此刻，无论征人思乡的感概，游子怀远的低吟，都让他思绪澎湃，但最终还是落笔在“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的通海秀山上求学读书时光。这里“灯火几时”引用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儿郎读书时”的典故，可谓恰到好处，简练至极。是啊，少年时“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生涯；朝起寄亭煮粥，夜至庙宇栖宿的生活磨砺，成就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宏大志愿，为的就是家国天下的抱负。

以郑开文一贯的行文作赋的特点，他往往不假雕饰，真情实事，自然天成。匹马、楼兰、飞鸢、灯火、风雨、寄亭、朝与及物动词“入”“仰视”“最难忘”“煮粥”链接在一起，变得动静浑然一体，眼前景，心中情，前人思，今人意，一股脑涌动开来，勾联起阅读者无比清晰的遐想。此时此刻，郑开文双手勒紧马缰，伫立于戈壁沙漠，抬头仰视蓝天翱翔的巨鹰，俨然是郑开文“保家卫国、为国建功而不惧戈壁沙漠、马革裹尸”的夙志得尝的完美注解。因此，该楹联叙述的真情实感，只有置身于万里征程、大漠戈壁、战马嘶腾的情境之下，才会有如此的感情宣泄，显然不是边塞军人为国戍边的泛指。这是郑开文曾到达新疆腹地楼兰古城并参加了征库平叛战争的直接证据。

1913年发生的科阿战争，以保留了部分阿尔泰领土归为新疆管辖的局部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中蒙双方最终于1913年12月21日签订《阿尔泰科布多中蒙军队驻扎线临时停战条约》，根据条约，沙俄终于承认，阿尔泰地区不属于外蒙古管辖，这样，从法律条文上，确定阿尔泰属于中国新疆，外蒙政府无法对新疆阿尔泰地区实施占领，双方撤军停战。

科阿战争结束后，郑开文回北京陆军部复命，受到北洋政府的重大嘉奖和蔡锷将军的由衷赞赏，留有一件实物佐证。

现存云南德善书院“奋绩绥疆”匾额为时任云南都督蔡锷题赠，郑开文书、立。此匾额长、宽、厚为185×65×5厘米，黑底描金字样，仅有寥寥数字：云南都督蔡锷题赠：奋绩绥疆。陆军

步兵上校、一等文虎章郑开文立。虽然此匾额包括题书者署名在内仅有 27 个字，但是从云南都督蔡锷题赠内容和立匾者郑开文的身份来看，显然与郑开文率部征库事件相关。



蔡锷题赠《奋绩绥疆》匾额，郑开文立（昆明德善书院严庆洪先生提供）

“云南都督蔡锷题赠”一语，表明此次远征库伦事件是发生在蔡锷云南都督任内，即便郑开文征库任务结束后在北京遇到蔡锷，仍然以“云南都督”相称，不但展现蔡锷与郑开文非同寻常的关系，也是蔡锷将军对郑开文的由衷赞赏和以昭殊绩。郑开文回昆明后，将此内容制匾，以铭永久，表明其非常珍惜蔡锷对这段经历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解读“奋绩绥疆”匾额内容，显然指安抚边疆，即郑开文率部远征外蒙、参与科阿战争这件事。皆因 1913 年间，中国境内发生战事的主要冲突点和主要方面就在西北疆域与外蒙古、俄罗斯接壤处，郑开文奋力作战的功绩是安抚、平定了疆域，建树了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的重大功绩。与此相对应的 1912 年的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事，在所有战争指挥、函电公牍里，均称西藏为“藏”“前藏”，或称“滇藏边”，没有称之为“疆”的。即蔡锷将军所赠匾额内容确指郑开文远征新疆、库伦这件事。

“陆军步兵上校、一等文虎章郑开文立”字样则表明郑开文由于远征新疆抗击蒙俄的殊绩，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虎章”。此为当时民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军功奖章。这是非同寻常的表述，因为民国政府“文虎勋章”的秩功稽勋制度，始设于 1912 年 12 月，共分九等（后有变动），分别授予陆海军中有战功或劳绩者。其中，一、二等授予上等官佐；三至六等授予中等和初等官佐，七等以下授予士兵。按民国初期的稽勋惯例，一等文虎章一般只授予都督、军长级别的立功人员。如，1913 年 12 月，因指挥平定大理之乱有功，云南都督唐继尧被政府授予“一等文虎章”，云南都督府参谋长庾恩旻“加陆军中将衔，奖三等文虎章”。郑开文时为陆军上校军衔，若无特别重大的战功勋绩、或有重大战功而殉职于战场，显然不能得到一等文虎章的，间接表明郑开文参加了新疆西北线察军通古、阿尔泰战事，著立有重大功勋，才受到如此破格的嘉奖。

有两个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期的内蒙古白灵庙一线，民国陆军第八十混成团（其兵力相当于旅级编制）徐廷荣部，在库伦派来南犯之蒙匪沿绥库大路侵入内蒙，占据白灵庙等地以为根据，厉兵秣马，乘势南进欲遂侵掠归、绥二城之际，“中华民国二年（1913 年）六月，绥远张（绍曾）将军派遣晋北军队迎击，屡战未克，故电调本混成团来此，以资抵御。”徐廷荣部在内蒙古白灵庙等处与外蒙军队两次征战，长达半载之久，战绩斐然，战功卓著，被民国政府授予“二等文虎章”并特授“勋五位”，其他官佐均授予四等文虎章，晋升上校、中校不等。^[11]

其二，1913 年 6 月，内蒙古北线，以玛克萨尔扎布为首的外蒙军队越过乌珠穆沁进攻塞北贸易中心多伦若尔（多伦市），民国军队频频失利。仓促间，袁世凯临阵换将，调王怀庆署多伦若尔镇守使，同时授为陆军中将，命他抵御外蒙入侵。王怀庆是北洋军中老资格的军官，像曹锟、吴

佩孚等人还在家啃老苞米时，他已经是北洋军的协统（旅长）了。虽然此公长期以来位不过师长，但由于多年担任北京卫戍部队的首长，民国风云激荡，什么事都赶上过，所以在民国史上还算有点知名度。王怀庆率部九战九捷，一举收复蓝旗、白旗等地，粉碎了外蒙库伦当局试图合并内蒙古的妄想。1913年8月28日，民国政府特授“二等文虎章”以资表彰。9月10日，北洋政府令：“镇守使王怀庆到防未久，迭获胜捷，调度有方，谋勇兼备，应特授勋五位以奖殊勋。”

同样是率部参加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与徐廷荣部、王怀庆部在内蒙古白灵庙、多伦若尔等处与外蒙军队征战的战绩比较，郑开文应该在征库战争中有更为上乘的战绩、更为巨大的殊勋，才可能获得“一等文虎章”嘉奖。

细想起来，北洋政府对郑开文破例稽功的因素可能有：其一，战线遥远。郑开文从云南出发时，仅率云南军官、参谋数人，在广州结集滇桂黔各部，组成滇桂黔先遣队，开赴前线（因为缺少相关资料，对此行军线路不详）至兰州，再徒步至甘肃、青海至新疆若羌、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勒泰；或从甘肃兰州沿河西走廊抵察罕通古、阿尔泰，行军路程均超过7000公里以上。其二，率部众多，郑开文所率滇桂黔先遣队估计达到一个混成团的规模，千人以上。据有资料的情况分析：进入新疆奇台县境至察罕通古、阿尔泰为准格尔沙漠，计由蒙古官路十三站，每站有长至两百余里者，且长途戈壁，没有粮草、水源，部队所需完全是自备自带，时文撰述：“雇驼随同兵队前进非带三月之粮不可；每步兵骑驼一支随带粮一百数十斤可供三月之用；马队一名备三月粮料必须四驼转运，加以夏日炎风酷烈、水草不敷需、驼（马）过多是以启行不能从速。”即援军必须自带三个月以上的粮草、饮水才能出发，每名步兵需用一匹骆驼；每名骑兵需要四匹骆驼转运，才能保障供应。可见，郑开文率部千余人，加上随行骆驼、马匹、马车，行军在茫茫戈壁沙漠，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孤军深入，尤与内地用兵不同，这支庞大的行军队伍，即使没有实际参加战斗，胜利归来，其组织、管理的才能，就非常了不起。其三，参加了第二次科阿战争，并在局部地区，杀敌制胜，功勋卓著。只因袁世凯着意隐去内地军队援疆的事实，故不事公开表彰。

前面提到1912年的云南援藏平叛战役中，郑开文统领西征滇军第一纵队，首开民国肇立后中国军队对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边境民族地区的作战之先河，攻克滇藏边盐井、毕土重镇，剑指芒康、波密、江达，为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建立了功勋。若不是英帝国主义的极力阻挠和某些军阀抢功邀荣、封建割据思想的作祟，说不定郑开文就能一鼓作气将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高原。但是，在袁世凯阻挠和某些地方军阀势力的作祟下，西征滇军功亏一篑、西征事业半途而废之时，郑开文忍无可忍，直接上书参议院、蒙藏事务局、全国民众，揭露袁世凯政府治军无能、指挥混乱，得罪了大总统袁世凯。在论功行赏时，格外将功勋卓著的滇省西征军联长（相当于混成旅旅长）郑开文授予“四等文虎章”“擢升”为陆军上校，其他副职人员也授予“四等文虎章”，晋升为上校，明目张胆地进行打击报复。在外蒙古受沙俄唆使独立、战事纷扰的紧急情况下，袁又以擅长军事、指挥若定的褒奖，调遣郑开文率军万里，支援新疆西北线察罕通古地区的战斗，打击沙俄帝国、外蒙古妄图侵略新疆的阴谋。郑开文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并未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民国总统袁世凯打击报复的逆境中，克勤克力，骁勇善战，最终圆满完成征战任务，连老袁都不得不赞赏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作为对以往种种误会、孟浪举动的歉疚和补偿，格外授予“一等文虎章”，随后又于1914年4月，破例将郑开文从边远云南调到沿海富庶的

广东，代理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其时，广东军队有两师一旅，混成旅相当于师级编制），并很快晋升为少将，其地位的显隆和职责的重要不言而喻。因此说，郑开文获得民国政府颁发的“一等文虎章”的嘉奖，事出有因，然远征新疆，抗击俄蒙军队入侵的斐然战功是主要因素。

参加援藏平叛和远征库伦可以说是郑开文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军人为国征战，马革裹尸是荣耀，是生命的价值所在。可惜，只因世事难料或严守国家机密，没能留下全面的历史材料，深为憾事。如果今生有幸，期待可以发掘到更多的材料，重现郑开文率部远征万里的壮举，当是一部堪比拿破仑远征东方的传奇故事。

【相关链接】

“匹马入楼兰”楹联的创作特点与赏析

匹马入楼兰，仰视飞鸢，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

只身还栗里，倦怀归鹭，好藉此名山老去，松杉曲径昼眠琴。

——邑人炳然 郑开文题书 中华民国五年孟冬

这幅曾经悬挂于秀山公园海月楼廊柱上的楹联，通海的乡亲们习惯称之为“匹马入楼兰”对联，挺长的，共46个字，表达的意义也十分丰富。这开头的“匹马入楼兰”一语，其实就是谋篇布白的画面，避开正面铺叙，通过气氛渲染和环境的描写，即形成一种雄浑苍茫的意境。借用历代评价词联诗章惯用词语来说，就是“兴发高远”之意。

“匹马”可以理解为孤身一人，但是，军务繁忙的云南人郑开文绝无闲情逸致孤身一人入疆游山玩水。从郑开文率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和率部远征库伦的经历来看，当可以理解为远征戈壁沙漠的最高军事官长，引领千军万马厮杀疆场的将军，对自己所承担任务的自信、责任感，同时渗透着戈壁沙漠行军打仗的孤寂、艰苦之感。

接下来的“入楼兰”一词最为显意，楹联中“楼兰”当然指新疆腹地楼兰古城，作者巧妙地将眼前戈壁沙漠的远征将士与楼兰的悠久历史和著名边塞军旅诗词联系起来。着意这一点，你就能明白这句联语的壮怀激越之处：它是远征将士“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精神风貌的写照；它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豪迈气概的潜台词；它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凌云壮志的蕴含；它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拓疆域御敌寇的壮怀激烈；它还是“功名祇是马上求”的军旅征战生涯的象征。这样一来，笔墨非常洗练的“匹马入楼兰”五个字，就把远征将士的豪迈气概，衬托着捍卫国家利益、领土完整的勇敢壮举，表达无遗，痛快淋漓。

“仰视飞鸢”则交代了心境和位置。当然，中国西部众多名山大川都有雄鹰翱翔在蓝天白云之上。但是，唯有大漠戈壁的雄鹰最为壮硕，最为孤寂勇猛，寓意远征库伦的将士不畏敌军之强大，不怕征途之遥远，不惧戈壁大漠之荒凉的报国壮志像雄鹰一样志存高远。作者仰视飞鸢而触景生情，此时此刻，无论征人思乡的感慨，游子怀远的低吟，都让他思绪澎湃，但最终还是落笔在“最难忘灯火几时，风雨寄亭朝煮粥”的通海秀山求学读书时光。这里“灯火几时”引用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儿郎读书时”的典故，可谓恰到好处，简练至极。是啊，青少年时“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生涯；朝起寄亭煮粥、夜而庙宇栖宿的生活磨砺，陶铸

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宏大志愿，造就了家国天下的远大抱负。此时此刻，楹联作者双手紧勒马缰，伫立于戈壁沙漠，抬头仰视蓝天翱翔的巨鹰，俨然是“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的风志得尝的完美注解。

“风雨寄亭朝煮粥”似乎又拉开了通海秀山最有文化意义的册页。对于没有到过云南省通海县秀山公园，或对秀山了解不多的读者，往往对“寄亭”一词存有疑虑，倘若用动宾结构解意，则使该楹联不能得以正解。若视“寄亭”为名词，又不知出于何处，殊为纠结。可否允许笔者科普一下通海秀山瑰宝之“寄亭”？

云南地缘辽阔，有的是大江大河、名山大川，古今文人墨客、佛众信徒却唯独把昆明西山、大理鸡足山、武定狮子山、通海秀山称之云南四大名山，看重的就是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腴的文化积淀。秀山，独秀于滇南诸峰，北对杞欂湖（又称双湖），湖光山色，得天独厚。秀山上扶疏茂密的各种树木，那些生长数百千年的苍藤古树，虬枝盘空，浓荫蔽日，把整个山峰覆盖得严严实实。秀山上有泉水汨汨，万古涓涓，如雪如练，日夜奔流杞欂湖。秀山有碧涧丹岩，宜兰草生发，通海剑兰、虎头兰、春兰，最为清香馥郁，芳气飘远。

相传自西汉武帝元鼎（公元前116年）町王毋波在秀山建古刹，唐、元、明、清各代建庙宇修寺观赓续不辍，历经二千年而不衰，形成以三元宫、普光寺、玉皇阁、清凉台、涌金寺、白龙寺为主体的六大主建筑群，成为滇南佛老盛行之地，钟鸣鼎烟，悠悠袅袅。

如此千万年的自然景观与数千年文明结晶的秀山，自是古刹参错，叠阁凌虚，层楼映水，含烟晓雾；柏木葱茏，松风萝月，飞瀑如练，兰芳摇曳。骚人韵士选胜登临，莫不情思缱绻，翰墨泼洒，为秀山吟诗题词、撰书匾联、精刻碑文，其书法辞章之考究，诗情画意之练达，冠于滇南。

但是，若论秀山最有价值的文化遗迹，则必选“寄亭”和“寄亭诗碑”无疑。“寄亭”是通海秀山公园内的一间亭子，色彩灰褐，蜷缩于一隅而不引人注目。寄亭小巧玲珑，建造者朱阳称“一亭人谓如拳耳，是海吾将欲袖之”。恰恰因为小，小到不能再小，便有了文人墨客以小喻大的诗情画意。邑人沈昭谓“天海双明镜，乾坤一小亭”。“寄亭”之名的原创，隐约是从王文治“省时身如寄，空亭聊可居”诗词中推断而来，其意源自大文豪苏轼“十年江海寄浮沉，梦绕江南黄苇林”之“寄”也。

“寄亭”为时任知县朱阳所建，据说筹建此亭的初衷无非是想改善下官舍的居住条件，有个读书养性之所。没曾想因为王文治留下的诗句墨迹，承载了南来北往文人墨客的思乡情愫；记录了外来官绅士子荣辱不惊的人生感悟，从此闻名遐迩，被世人称之为秀山最有价值的文化遗迹。

“寄亭诗碑”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淡墨探花王文治的真迹：

省时身如寄，空亭聊可居。
官衙原传舍，天地本蘧庐。
竹气拂云冷，林烟倒海虚。
未须投绂去，已自狎樵渔。

桐野老前辈构寄亭于秀山之麓，公暇辄吟啸其间。欧之丰乐，苏之喜雨，无谓古今人不相及也，率成一律，伏惟雅正。

管侍 王文治

王文治，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出任云南临安（今建水）知府，他的老朋友朱阳（字桐野，号菁溪，福建漳平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已在通海的山水中遊弋三年了，两个老朋友“他乡遇故知”，其感慨万千之情，可想而知。清代通海县归临安府管辖，朱阳既是王文治的下属，又比王文治早到云南，按理该是朱阳到建水拜访王文治，但山高皇帝远的现实淡化了权力等级，近200里的崎岖小路阻不断梦回江南的感觉。从寄亭诗碑的内容不难看出，王文治初到通海即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江南情韵，风尘仆仆的他不仅在这个被誉为“云岭江南”的高原坝子看到了酷似故乡的山水，让远涉万里的诗人在崇山峻岭中感受到一种故乡的亲切。还从这个滇中小县的民风民俗中听到了依稀仿佛的乡音，生出一种同根同源的故土之恋，触动着江南文化最强烈的共鸣。

在乡音乡情的奇妙邂逅里，他惊喜地触摸到一种故土文化的温暖，这种感觉与执宰通海的朱阳不谋而合。于是，因山水情缘而建的寄亭和因顿悟而生的诗碑成就了这两位江南才子在秀山上的文化丰碑。

王文治的“寄亭诗”，脱去了官场的俗气，在深刻厚重的生命反思中落笔于幽默清新的自嘲“未须投绂去，已自狎樵渔”，这是临安知府王文治真正进入随化、自在的标识。王文治二十几岁时就以诗书双绝名动京城。乾隆二十一年（1756），翰林侍读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二人仰慕王文治书名，遂邀其同往。王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潇疏秀逸之神韵，深得琉球士绅激赏，纷纷重金求购王文治墨宝，让这个26岁的小伙子书名大震。今天的日本冲绳博物馆，仍然珍藏着王文治当年的书作，可见其盛名远播。四年之后，王文治进京殿试，得中一甲第三。王文治年纪不大，却诗书独步天下，可惜他不是王室宗亲有世袭倚仗；不是八旗子弟无恩荫赓续。寒窗十年，不过是个不入流的进士、翰林，即便做个流官，自然不能优渥分配到富庶的江浙苏皖为官，万里远放临安知府，亦不过类于黜退流放边塞而已，仅仅是读书人谋个生计，与乡人以伐柴捕鱼谋生无异。这约略可以觉察到那么一点为官万里之外的幽怨，但这种感情很轻很淡，一种随缘聚化的豁达冲淡了个人的荣辱得失。

随缘聚化的境界不是凭空而生的，它的根源就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不妨来研究一下王文治在诗后附记中提到“欧之丰乐”之欧阳修与“丰乐亭”；“苏之喜雨”之苏轼与“喜雨亭”。这两个屡遭贬谪却豁达睿智的宋代官员都以其出类拔萃的文采独步天下，而“丰乐亭”“喜雨亭”至今仍然名声遐迩，千年不衰。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开始与山水结缘。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亭饮酒赋诗，欧阳修自号“醉翁”，遂以此号命亭，并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醉翁亭因此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而作为醉翁亭的姊妹建筑——丰乐亭，则是欧阳修在滁州任上自己掏钱修建的。欧阳修在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环，构小亭于泉侧。”此《与韩忠献王书》文辞表明，欧阳修是在与山水之美的偶然邂逅中萌生建亭之意的。《丰乐亭记》曰：“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芒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焉。”丰乐亭命名的缘由，透过字里行间，我们

可以感受到欧阳修此时的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被贬滁州丝毫没有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任何阴影，他的心地是坦荡磊落的，这是一种真正淡泊功利的单纯之美，在他眼前，自然景色“无不可爱”，而“丰乐亭”，取的就是“岁物之丰成”“与民同乐”之意。

与欧阳修略有不同的是大文豪苏轼在建喜雨亭时还没有遭受贬谪之苦，此时苏轼才26岁，初入仕途，正是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他受朝廷诏命到陕西凤翔县做“签判”，虽只是文书一类的小官，但他并不觉得委屈。此时他精力充沛，才情卓越，最喜独创。到任不久，就掘沟引水，垒墙修圃，把府衙后一块荒废多年的空地，改造成一个赏心悦目的小花园，又在园中心的土丘上修了一座可观赏全国景色的亭子。时逢大旱，亭子修成时，下了一场大雨，官民皆大欢喜，苏轼便把这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他在散文中写道：“亭以雨名，志喜也，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苏轼在文字里流露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肺腑的，与民同乐的思想也是他日后无论被命运打进怎样的深渊也能积极有为的坚实基础。

两位大文豪殊途同归，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都能胸怀天下，与民同乐，保持了一种自然真淳的快乐。正如欧阳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胸怀，它超越了个人狭隘的是非得失，怀抱天下，坦荡磊落，无论人生如何变幻，他们不怨天，不尤人，随遇而安，笑对现实，积极有为。王文治在诗后记中说：“欧之丰乐，苏之喜雨，无谓古今人不相及也。”其实，古人今人，隔着的只是一段时间而已，有思想、敢作为的人，都是这样面对人生与命运的。

郑开文祖籍南京，通海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之邦。他留学东瀛，建勋南京，征藏征库，驰骋两粤，脚步迈出通海前人的范畴，对寄亭诗碑所表达的思乡怀旧之情结、因山水情缘而生之感悟最为透彻。郑开文护国战争胜利后回到云南，百忙之中，亦有楹联回报这滋养他的通海秀山。“别去十年，曾经大地山河从新整顿。归来万里，只见双湖云树依旧葱茏”，其情其意，无不演绎着“古往今来，贤者所怀者何？惟生命与人生而已”，把生命和人生奉献给中华民族，奉献给生于斯、养于斯的热土乡梓，岂不痛快乎！

如果说，“匹马入楼兰”上联是描写慷慨激昂的军旅生涯的话，那么，下联“只身还栗里，倦怀归鹭，好藉此名山老去，松杉曲径昼眠琴。”则是展现了郑开文对息影林泉的美好生活的缠绵、欢快和期许。“只身还栗里，倦怀归鹭”是金戈铁马的将士渴望放马南山，归隐桑梓，安享祥和平静生活的写照。此处“归鹭”是陶渊明诗句“倦鸟知归”意境的延伸和递进，与上联“仰视飞鸢”的“鸢”字相合意相合韵。试想，满目蛮荒的楼兰古城、黄沙漫天的戈壁大漠、深邃蓝天上翱翔的“飞鸢”（老鹰），形成与残酷战争结束后“只身还栗里”的“归鹭”，形成搏击长空的雄鹰和嬉戏河池、厮守情爱的鸳鸯的强烈对比。此情此景，若无“飞鸢”与“归鹭”的排比递进，此楹联岂不缺少点战争之残酷与和平之珍贵的人文内涵。

有些撰述者在评述和引用此楹联时，因为对郑开文的身世缺乏了解，常以陶渊明“倦鸟知归”典故为据，把此联中“倦怀归鹭”的“鹭”字，擅改为“鸟”字，遂将此楹联的韵味、意境大打折扣。殊不知，郑开文在诗文辞赋上颇具功力，楹联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颇多，并且多半是

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但是用得妥贴巧妙，没有生搬硬套的痕迹。另外，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用心，抒情达意一气呵成，宛若京剧唱白一般，极具音乐感。所以，郑开文诗文辞赋的这两个特点，没有让读者对此楹联产生突然之感，突兀之嫌。

作为清朝末年的读书人，郑开文必然是熟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向往自由、平淡的田园生活，这点上他与陶渊明是有共鸣的。陶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刘裕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政局急剧变化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导致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不知廉耻。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开始，断断续续地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之类小官，四十岁时又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均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秉性而最终解绶弃职。一个正直的士人，其思想、行为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之间不兼容，注定在当时社会中绝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最终抉择归隐也是一种无奈的逃脱和失意的回避。由此可以窥见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当时的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他也深知自己无力改变、改造那个令人厌烦的世俗社会。“倦鸟知归”，他只是想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这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清高，极具积极的社会价值。

巧合的是，郑开文的身世与诗人陶渊明竟然十分相近。郑开文二十八岁离家去日本留学，写此楹联时，他刚好四十岁。十三年间，郑开文以极大的热情和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数千年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中，创办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同志会”、参加中国同盟会，以推翻封建建王朝为职志，更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胆略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为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而南征北战，屡建功勋。从郑开文楹联分析，其“匹马入楼兰”的豪迈气魄；其“曾经大地河山从新整顿”的人生经历，是封建社会里彭泽令、临安知府、通海知县等名吏重臣所不能比拟的，文章诗赋的情韵气概自然也有别于陶渊明、王文治、朱阳等文人墨客的思乡怀旧、回避现实的人生感悟和情绪表达。楹联中的“归驾”，不是陶诗里那只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飞翔、栖惶不安的“失群之鸟”，自然也不是无地可容、处境窘迫的“孤鸟”，而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胜利后尽享和平、宁静、富裕、爱情生活的“归驾”，尽显郑开文与陶渊明两种不同的遭遇、境界。因而，可以确切地说，“只身还栗里，倦怀归驾”的意境是另一种类型的“倦鸟知归”，也是陶渊明“倦鸟知归”意境所不能包含的，故此“倦怀归驾”一语的“驾”字绝不能用“鸟”字来替代。

应该说，由于各人的阅历不同，人生的取意亦不同，郑开文借取陶诗无心出仕和倦鸟知归的境界也不尽相同，有了这层意思的铺垫，下一句“好藉此名山老去，松杉曲径昼眠琴”就比较好理解了。此处“名山”当然指郑开文远征戈壁沙漠时心心念念的通海秀山。秀山纤小秀丽，山上扶疏茂密的各种树木，把整个山覆盖得严严实实，那些生长数百年的苍藤古树，虬枝盘空，浓荫蔽日。山岭上，古刹参错，柏木葱茏，其翠欲滴，其秀可餐，当是养老的好去处。但是，正值壮年的郑开文，未必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年龄，胸中仍然激荡着为国操劳、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对民主共和理想追求的步伐没有停息，“大地河山从新整顿”的勃勃雄心没有消沉。

年轻时，郑开文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与遥远的圣哲们一样，把喧哗与骚动的人生看作一种修炼，并以炽热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来拥抱人生。笃信自己“直挂云帆济沧洲”的鲲鹏之志，也必然具有“修身养性平天下”的人生轨迹。理想得偿、功成名就后必然回归“鹤琴桑麻，息隐林泉”的平静人生。因此“好籍此名山老去”是经历了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大气和豁达。花开无声，花落无言，这种渗透人生感悟的情愫，从激越的冲动终归于深沉的平静，是其背后所隐藏的佛老思想在反复涌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情怀的必然皈依。伴随成功而来的祝贺和荣耀，坦然平静地接受；面对打击、磨难、诽谤和压制，心平气和地接纳。这是经过生活的千锤百炼涵养出来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气。

郑开文“好籍此名山老去”，正是循着“匹马入楼兰”的征程仕途沉浮与荣辱过后，把心灵寄籍于田园山林之中，塑造出一个如大江奔流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而生生不息。前浪有幸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波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沉淀形成了一个带有自我欣赏的意境。慢慢老去，不是消极隐退，不是无所追求，而是一种积极中的淡定从容，求索中的豁达洒脱。

以一份洒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喧嚣的红尘，那样我们就能平静地看着岁月的风尘从自己身上走过，经年风霜烟尘，弹指间灰飞烟灭。一如那无言的花开花落，重归于尘，重归于土，不再惧怕青春已逝，生命消融。即便老了，也要让大度雍容成为一种宽广的胸襟，去恪守秉持；即使晚年，也要让大度雍容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去精彩演绎最后的人生。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楹联中“眠琴”一语的深刻含意。“眠琴”可以理解为用了拟人的手法，昼夜沉浸在琴声之中，象征着诗人安然自适的心态。唐朝诗人嵇康在《琴赋》里说琴声“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惜愴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悒，不能自禁。”郑开文撰此联时，想象自己老去暮年，远离世事纷扰，把自己的心声纵情倾吐在琴声里，让听到的人们能够体会其内心的丰满和曾经激越的过去，用琴声寻找知己、知音。松杉曲径深处，林鸟蜂蝶啾啾鸣叫，让他深自陶醉，恰似美妙的催眠曲，就此枕着琴睡在绿荫下。或者，楹联作者坐在松杉曲径旁的大石上，抬眼望去，白云舒卷，群鸟相逐，清流直泻潭底，水声、鸟叫、虫鸣交响在一起。弹奏者不愿意去破坏这浑然一体的天籁之音，所以才“眠琴”不弹。此时琴无声而胜有声，是何等的和谐、雅趣！

其实，郑开文引用“眠琴”一词还有典故，取意“淡泊名利”的内涵，让此楹联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大的伸展空间。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诗学上的不朽篇章，其中的《典雅》章更是千古传颂的绝唱：“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用玉壶载酒游春，在茅屋赏雨娱欢，座中有高雅的名士，左右是秀洁的翠竹。初晴的天气白云飘动，深谷的鸟儿互相追逐。绿荫下倚琴静卧，山顶上瀑布飞珠。花片轻落，默默无语，幽人恬淡，宛如秋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惟有这样情景下写出的诗才能称之为“典雅”，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诗品的最高境界。诗品即人品，典雅的文眼是“人淡如菊”。“人淡如菊”是花落而无言，那是一种命运，有什么好说的呢？菊花选择了秋天绽放，在霜雨中显现自己的清逸。当花季流去，往日的鲜艳不再，花瓣随风飘拂，悄然落地。就像花丛中那个眠琴老者一样，风雷激荡已过，富

贵浮云，淡然名利，于超然之中自能保持一分平淡、恬静的心境，并坦然接受生活中的各种烦扰，甚至是清贫和困苦，这是人生的必然归宿。

选择平淡，需要文化的熏陶、知识的积淀；需要胸襟的开阔、道德的支撑；需要从容与自信，更需要透视人生的睿智。经历过世事纷乱和潮起潮落的人生历练，才能涵养平常、淡泊、从容的定力。最能展现一个人品格的定力就是：在旗帜高扬时的收敛，在春风得意时的淡然清许；在面对厄运莅临时的旷达，在遭遇人生逆境时的从容与淡定，都能够荡荡泱泱而又舒缓自得。

郑开文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素有“礼乐名邦”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云南通海县，朝夕浸淫在先贤们遗留的辞赋诗联中，能不墨赤？此楹联声情并茂，文采斐然，更是将“匹马入楼兰”的豪迈气概；将“曾经大地河山从新整顿”的人生阅历写入通海楹联的第一人，实是通海秀山众多诗词楹联中独树一帜的佳联。虽出自于郑开文这样一个驰骋沙场的将领之手笔，以通海人才济济，百年时间竟无出其右者，足见郑开文自幼攻读文史，功底相当深厚。

楹联之美，往往就表现在似乎很常见的字词上，或者说，把似乎很平凡的字词用在最确切最关键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最能体现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匹马入楼兰”楹联的创作，自始至终伴随着从字一词一句一篇章各个层次上的营造，几乎所有的修辞方法均在此楹联中得到应用，使楹联内容的表达准确、鲜明、生动，语言的应用精炼、简明、趣味横生，以如诗如歌的艺术魅力感动着读者。通海的父老乡亲，尽管大多不太了解郑开文楹联的对仗合韵、经典掌故，却由于郑开文高超的楹联表现方法，将蛮荒辽远的大漠戈壁和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直白易懂的词语一一呈现。一如通海的酱油，红亮浓郁，洋溢着乡情乡音的通海味；一如通海名胜曲陀关的甜白酒，芳香甘醇，抒发着爱乡恋乡的绵长情结。特色、特点如斯，成为通海老百姓传诵百年的佳联，实至而名归。

[1] 现存云南省通海县秀山公园海月楼楹联，原载《通海秀山楹联辑》第11页。

[2] 《天南新报》1913年3月31日载，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文史资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3] 《西征滇军驻丽步兵第一营长贾紫绶电》，转载自1912年12月23日《天南新报》。

[4] 《鹤丽镇任暨丽维统领张贵祚电》，转载自1913年2月21日《天南新报》。

[5] 《孙中山致参议院电》，转载在《天南新报》1912年12月13日，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6] 《大总统决计征库》，转载自《天南新报》1913年1月11日，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7] 裴其勋撰《吉林剿抚蒙乱详细报告书》，转载自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8] 《天南新报》1913年2月10日载，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9]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一防蒙篇》之《电呈援科援阿情形文》。

[10]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一防蒙篇》之《电呈援科援阿军事情形并请拨兵饷文》。

[11] 陆军第八十混成团编印《征蒙战事详记》转载自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